



财富生产力比财富更重要

□ 王东京

岁末年初，人们自然关心今年的经济走势。去年受疫情影响，中央没有提出GDP增长的具体指标，而全年实际增长2.3%。最近有海外研究机构预测：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或8%。此数据令人欣喜，也备受鼓舞。不过我要指出的是，GDP增速能达到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质量。

我曾说过，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定会放缓。经济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100%。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等式右边分母越来越大，而由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分子与分母的比率铁定会下降。比如GDP为10亿元时，新增加产值8000万元，增长率为8%；而当GDP扩大到100亿元时，即便新增45亿元产值，增长率仅为5%。这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速放缓是客观规律。

西方工业国家的经验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今天的发达国家，皆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农耕时代经济增长慢；进入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到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又放慢了。20世纪50年代，美、日、德、法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8.8%、9.1%、4.8%；而新世纪的前10年，则分别降至2.1%、1.5%、2.1%、1.2%。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GDP规模就越大，经济实力也就越强。若仅从当期看，这样讲

没有错。但要是拿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作比较，得出上面的判断却是错的。要知道，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其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GDP增长率既不代表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而且作这种比较，还很容易误导人们追求高速度。

请读者看下面两组数据：1992年，我国GDP总量为2.7万亿元，增长率为14.2%；2019年，我国GDP总量近100万亿元，增长率为6.1%。若论增速，2019年明显低于1992年；可从新增加的产值看，1992年仅增加3800亿元，2019年却增加了近6万亿元。可见，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与一个国家财富存量（经济实力）并不是一回事。

再往深处想，一国的财富存量，其实也不代表该国的财富生产力。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有一个著名观点：不能将财富存量与财富生产力混为一谈。他解释说，财富生产力好比果树，财富存量则是果树结出的果子，财富生产力要比财富存量重要得多。是的，一个国家生产的GDP总值，只是该国的财富存量，而财富的市值，则取决于该国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

让我举个例子。现在有甲、乙两人，分别购置了100万元的机器。从存量看，他们的财富都是100万元。可甲的机器每年可创造10万元收入；乙的机器每年只创造4万元收入。按照资产定价原理：资产价格=该资产未来年收入/银行年利率。假定年利率为5%，那么甲的资产市值为200万元；乙的资产市值

仅为80万元。同样是100万元的资产存量，由于财富生产力不同，甲的财富增值了1倍；乙的财富却缩水20%。

由此分析，便有三点结论：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客观规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应继续追求高速度；第二，增长速度快慢并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所以既不必纠结增长速度高低，也不必拿增长速度作纵向或横向比较；第三，一国财富生产力比财富存量更重要，发展经济的重点是提高财富生产力，而不是追求GDP增长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说在过去高速增长阶段，经济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则应主要靠创新驱动。这不单因为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已难以维系；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盛行的背景下，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也已难以为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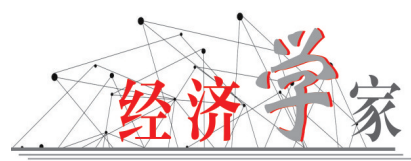
事实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们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

居全球第一，已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主要国家的先进技术产品已越来越难以引进，以前能够引进的现在也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断供”现象。

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打破西方国家的围堵和封锁，我们绝不能再追求高速度，而应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引领并主导全球创新链、供应链重构。为此，必须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的最高点。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人“卡脖子”问题。

转眼就到了2月份，“两会”召开在即，我这里写这篇文章，中心意思就一句话：各地在谋划全年经济工作时，不必过多地讨论GDP增速，而应把主要心思放在怎样改进发展质量上。



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 胡志平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服务不仅是人民美好生活重要内容，更是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重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合理增加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要合理增加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具有人力资本效应、消费乘数效应和消费挤出效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机制。首先，公共服务支出的人力资本效应在于政府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会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消费来源于收入，能力决定收入。人力资本是能力的关键因子。因而人力资本效应是公共服务内需效应的基石。其次，公共服务支出的消费乘数效应在于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引致国民收入增长。据经济学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引致国民收入倍增，进而居民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的扩张又会加速国民收入增加，这又会再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最后，公共服务支出的消费挤出效应在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负担较重，未来支出压力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被迫“挤出”了居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形式的公共消费增加，一方面能够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减轻居民支出压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推动内需扩大。由此，公共服务支出的内需效应成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关键机制。

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重点方向。公共消费来源于财政收入，疫情冲击下，财政收入增长受限，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压力递增。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不仅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中的公共服务领域支出比重，更要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效率提高意味着支出更少或质量更高，达到“四两拨千斤”效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为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指明了方向。通过激励主体、供求匹配改革和结构优化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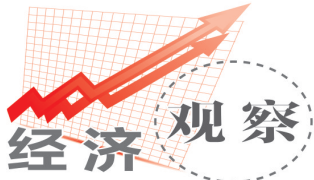
激励主体提高支出效率。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励地方政府这一责任主体。一是支出效率法治化。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激励地方政府责任主体的重要机制。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法治化成为激励地方政府责任主体提高支出效率的重要内容。因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支出捉襟见肘。提高效率的基础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公共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目前还缺乏一部完整权威的公共服务供给法，公共服务支出的有法可依还未实现，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为提效率奠定基础。二是支出效率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激励地方政府更有效的提供公共服务就需要将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传统绩效考核更多的是考核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指标，而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民生指标相对较弱；公共服务支出动力相对不足。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服务支出的内需效应迫切需要激励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和弥补民生公共服务短板。这要求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上更多体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供求匹配提高支出效率。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提升居民的获得感是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应有之义。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是居民所需的，支出效率显然不高。这要求从供需两侧改革推动。一是需求侧管理推动需求。精准识别需求是需求侧管理的基础。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需求表达过程，有效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网络化平台建设，能更加精准呈现居民的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需求信息，为供求匹配提

供坚实的基础。在需求精准识别基础上，要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还需对需求进行分类。哪些需求是基本的，哪些是非基本的；哪些是生成型层次的，哪些是发展型层次的，推动需求的分类管理化。分类管理为精准对接供给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基础。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匹配需求。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单一供给模式难以有效匹配居民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支出效率低。不同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发挥不同供给主体作用，是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又一关键。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既有生存需求更有高质量阶段发展需求，因而根据需求侧分类管理的结果匹配不同供给主体，引导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匹配形成不同供给模式更好回应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才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结构优化提高支出效率。传统的公共服务支出存在两大偏向：一是偏经济建设轻社会民生，二是偏城市轻农村。因经济建设型——“铁公基”等基础设施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明显，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首选。进入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服务支出短板凸显。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可通过公共服务支出的结构优化，即从经济建设型向社会民生型转向，更好弥补社会民生型需求短板。长期的经济建设型支出偏向存在边际效应递减，通过结构优化，有效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才能更好发挥扩大内需效应，从而整体上提高了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由此，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就是要合理增加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即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实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传统的公共服务支出不仅存在重经济轻民生，也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推动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要破解城乡结构失衡短板。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内需效应，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又一重要路径。

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不仅是成本收益考虑，更重要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居民的获得感。要通过激励主体、供求匹配和结构优化三个层面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有力推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重在协同共治

□ 陈龙 马源

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财税和金融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财税”和“金融”放到一起，强调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这把整个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到一起，更有系统性、也更能凸显集成创新等，进而形成体制协同效应。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是应对新挑战和实现发展目标的有效保障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化趋势迟滞，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加大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从国内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和一些关键技术急需提升与突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从机遇来看，疫情冲击下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得以彰显，数字化革命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变革，为我国“弯道超车”创造条件。把握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把握机遇，应对新挑战，将我国的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既是下一阶段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应对新挑战、把握发展机遇、实现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力保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枢纽作用，对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进行全球经济博弈、维护大国利益的重要武器。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目的就在于充分发挥财政和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充分调动市场

主体积极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力推动“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稳步实现。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义在于协同共治，形成“1+1>2”的体制协同效应

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一直是我国体制改革的重点，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也一直是改革领域的高频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不同于以往“现代财政体制”“现代金融体制”“财政与金融协同性”等提法，这是中央首次将财税和金融紧密耦合，从系统性、整体性体制机制建构的角度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是应对新变化新挑战、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迫切需要。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系统的关联性不断增强，要求协调推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任何一个短板，将会制约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整体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增强系统和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纵使财税、金融体制有各自的运行规律，但二者“各行其是”难以保证政策效力的有效发挥。深入推进整体性改革，必须加强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协调配合。

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协同和契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国治理的水平。这不仅体现在国内治理层面，也体现在全球治理层面。从国内治理来看，如果财政沦为“小财政”“政府会计或出纳”，将不仅不能有效统筹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也降低了政府治理能力，更无法发挥大国财政的治理作用。只有从大国治理的视野出发，加强财政与金融的协调，才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全球治理来看，大国财政是大国金融的基础，大国金融最终要财政来支撑，二者的协同程度，同样决定了大国在全球竞争中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因此，应对全球形势的变化，提升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必须要求财税体制

和金融体制在协调上更进一步。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首先要具备现代化制度特征，要契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重在协同共治。财税、金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单独考虑财政或者金融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防范“决策孤岛”，促进财税、金融领域改革效率的提升，弥补治理短板，形成“1+1>2”的体制协同效应，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着眼系统性重构和制度协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围绕当前和今后的发展目标和应解决的问题，从系统化、整体化、全局化的视角设计和推进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加强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协同性，要注重体制内部的协同性，即增强预算、中央与地方关系、税制三大财政改革内部的协同性；按照建设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与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的要求，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内部的协同性。同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其一，加强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协同性，提升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财税、金融要拧成一股绳，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提升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时，针对党中央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提出的新思路、新要求，配合相关领域的战略调整，完善制度设计，使其与战略转型相匹配，提升制度安排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

其二，加强预算、中央与地方关系、税制三大财政改革之间的协同，提升财政资源统筹能力和治理能力。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使“钱”与

“事”有机统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强化零基预算的理念，改革预算编制方式，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按照事业发展重点和业务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资金，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完善绩效评价的目标和方式，坚持结果导向，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和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防范地方财政风险。深化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上收部分事权，增强中央财政支出责任；适当放权，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进一步明确共同事权的责任，提高央地权责匹配度；因地制宜加快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注重税制功能协调，建立科学、公平、规范的现代税收制度，并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升税收征管的效率。

其三，增强金融体制及相关改革的协同性，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消除“玻璃门”“弹簧门”等壁垒，为实体经济营造一个个公平规范、安全高效、富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全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完善退市等制度，提升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解决更多优质企业的直接融资问题。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及对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的统筹监管。

其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协调的重心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间以及政策内部在调节总需求时的协调配合；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中，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在解决短期突出矛盾和培育新动力、促进长期发展之间的政策协调配合。

